

国家在场视阈下三山国王信仰在当代社会的功能

陈志文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650504；

摘要：“国家在场”理论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民间信仰是地域文化的关键部分，其变化揭示了社会和民众心态的历史演进。潮汕的三山国王信仰在文化传承、社区团结、社会治理和海外侨胞团结方面有重要作用。国家政策的支持让这一信仰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同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研究三山国王信仰的当代功能和价值，旨在为其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并为其他民间信仰的传承提供参考。

关键词：三山国王信仰；国家在场；社会功能；潮汕

DOI：10.69979/3041-0673.24.7.045

2024 春节期间，潮汕地区的舞龙舞狮和“营老爷”活动在海外如伦敦、巴黎等地广受欢迎，展示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这些活动不仅缓解了海外华人的思乡之情，也让外国人体验到中国春节和民间宗教的魅力。潮汕地区特有的“三山国王”信仰，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历史，对新时代的社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具有重要价值。

1 三山国王信仰与国家之历史渊源

1.1 起源传说与信仰形态

三山国王信仰起源于广东潮汕地区，其祖庙位于揭西县河婆镇，已有 1400 多年历史。最初，三山国王指的是巾山、明山和独山这三座山。人们将这些山神格化，并创造了相关传说。据《明观庙记》记载，三山神在唐朝有功于皇帝，在宋朝时被封为王，并赐庙名“明观”。宋仁宗时期，三山神又加封“广灵”二字。因此，潮州及周边地区纷纷建庙祭祀三山神，其香火一直旺盛。三山神从将军、元帅到护国王的演变，反映了封建王朝对忠义之士的尊崇和民众对英雄的敬仰。三山国王信仰也从个人崇拜演变为有组织的游神赛会，涵盖全村至整个地区。祭祀活动包括常规祭祀和“猪羊祭”，后者是规格最高的传统仪式，延续自韩愈时代的“少牢之祭”，整个过程庄严肃穆，持续近 3 小时。河婆地区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至廿四日举行游神活动，祈求丰收与平安，其中“举王爷”环节尤为壮观，最后在村外进行火的洗礼。

1.2 封建王朝时期的官方认可

“三山国王”故事形成流播的历史，也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和王朝典章制度在地方社会推广、普及的过程。需要解释的是，“三山国王”封号中的所谓“国王”，原指“报国”“宁国”“丰国”之王，本意并非三个“国王”，而是三个帮助国家的“王”。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

三山国王“肇迹于隋，显灵于唐，受封于宋”的故事。刘希孟认为，“三山国王”信仰的正统性源于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的两次“显灵”，并得到北宋皇帝的封禅^[1]。这反映了民间对皇权和神权关系的看法，即国家承认是神明正统性的关键。民间传说虽多样，但都强调神明对国家的贡献和获得皇帝封赠，以此证明其对正统王朝的支持，从而确立其正统性。

在中国台湾，三山国王信仰的传播得到了地方官员的支持，他们资助寺庙建设，推广国家制度和法律。三山国王宫庙的碑文规范村民行为，反映了乡村秩序。李秀萍指出，三山国王的信仰自宋代起就已演变为展示地方与中央王朝联系的标志。这一信仰既是地方守护神，也是朝廷官员用来引导地方民众的手段。通过封赐和称号的授予，王朝试图保持地方的统治秩序，同时不得不依靠地方势力的协助，因此对地方神明表示了认可^[2]。

1.3 三山国王信仰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机制

传统中国政府并非完全世俗，民间信仰与政权间有紧密互动。王朝教化与潮汕社会的契合，经过长期复杂互动，三山国王信仰的形成及象征意义转换与此过程密切相关^[3]。三山国王信仰的起源和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社会背景紧密相连。据刘希孟的《明观庙记》记载，三山国王信仰起源于隋朝，唐朝时显灵，宋朝时受封。在宋太祖平南汉和宋太宗征北汉时，三山国王显灵，北宋皇帝因此封禅。当时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民间信仰提供了发展环境。同时，潮汕地区作为国家边陲地带，面临周边挑战，民众寻求神灵庇佑，三山国王信仰因此兴起。明清时期，官府与乡民关系微妙，推行文化教化，但未影响三山国王。尽管未获官方承认，三山国王信仰因士大夫宣扬和官府默许而存续，反映了官方教化与民众道德自觉。王朝教化与地域社会契合中，三山国王成为交流媒介。历代王朝选择性地民间信仰纳入国家祭祀，反

映了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并在地方治理中形成了国家权力的元素，展示了国家与地方的互动。

2 三山国王信仰中国如何在场

中国民间宗教普遍维护社会秩序，民间信仰作为地方文化和精神体系，具有世俗化特点，源于民众，服务于民众。历史上，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国家发展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因此历代都有官方的农神崇拜仪式，旨在加强与民间的联系。这些仪式让农民相信，朝廷在祈求超自然力量帮助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有效控制了超自然力量。通过履行经济功能，官方祭拜农神的庄严仪式成了一种象征，令人意识到国家的集体存在^[4]。在现代国家，国家对民间信仰仪式的参与呈现制度化、多元化发展。

2.1 作为政策法规的国家在场

民间信仰活动仪式的合法性是由国家赋予的。所谓的合法性，原本是指“人们对于权力的认可，这种认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上，如认同、价值观、同一性和法律等^[5]”。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民间信仰工作的决策，结合本地实际，坚持“尊重事实、把握特点、规范管理、积极引导”的原则，推进民间信仰事务规范化管理。国家通过政治权威和制度，确认并支持特定民间信仰活动，包括活动场所的维护、仪式的接受，以及提供经费资助。例如，三山国王信仰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祭典和祖庙分别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单位。此外，三山国王祖庙还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些措施为民间信仰的当代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反映了国家对民间信仰活动合法性的认可。

2.2 作为权力和资源的国家在场

潮汕地区历来是包括族群、地域、权力、伦理和制度等多重因素在内，时刻影响着地区稳定。针对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宗教世俗化的行为取向，国家显然不可能对民间信仰活动视而不见置之不管，恰恰相反，国家始终保持对民间信仰活动的高度关注。民间信仰活动的规定性就折射出国家在信仰活动方面的身影。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家以间接的方式影响信仰活动中外在形象的塑造，二是国家直接运用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手段参与民间社区的信仰活动。三山国王祖庙由于近几年来参拜人数增加，附近道路比较狭窄，在重大节日活动时经常堵塞。在政府主导下，附近道路翻新，三山大桥于 2024 年初建成通车。大桥以“三山国王”

命名，快速完工得益于政府资金和民间捐款。重要节日时，当地政府和部门精心组织，确保活动顺利，展现了国家因素在民间信仰中的作用。

2.3 作为符号象征的国家在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制造业也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异彩，硬实力不断得到提高，在国际上话语权也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符号”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但是作为文明古国的文化软实力影响仍旧逊色，文化软实力符号的发展需要文化自觉。潮汕的三山国王等文化符号通过营老爷等活动在国内外传播，人民网等媒体对此表示赞赏。这些活动不仅帮助海外华人庆祝春节，缓解思乡情绪，也使外国人体验中国民间信仰，促进了文化的国际交流。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国家的支持，以更好地展示“中国符号”和文化自信。在三山国王的座位排列也反映了皇权下的国家符号。明山、巾山、独山分别封为大王、二王、三王，但祖庙中三王居中，据说其因骁勇善战和法力广大而受皇封正位。尽管三山神为结拜兄弟，传统上长者为首，虽是全面尊行“长幼有序”之礼，但在封建社会，皇封决定地位，即使幼弟为君，长者也需向其叩头参拜。

2.4 作为国家意识和地方社会观念的国家在场

民间信仰之种种仪式承载着国家意识与地方社会观念的对接。涂尔干认为，“宗教是社会情感的载体，提供象征和仪式，从而使人们得以表现将他们和他们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深厚感情。”^[6]就是这种载体，在民族社区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中以符号或仪式的形式将国家与地方联系起来。潮汕地区众多庙宇的匾额、楹联等展示了国家认同，如“国泰民安”，“忠诚怀义，福佑两岸”，“佑我军民，神威庇民”等标语。这些符号无论民间或政府推动，都受到社会热烈响应。信仰活动中的仪式成为传达政治理念的有效途径。这是因为民间信仰包含了丰富的仪式，“一直被作为宗教的一个社会实践和行为来看待。”^[7]三山国王信仰的祈福活动，旨在祈求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和程序，如抬神像、上云梯施法等，最终以潮剧结束，通过这种仪式，原本平行的国家与社会、世俗与宗教走向了对话与对接。

3 国家在场：形塑民间信仰的力量

3.1 经济功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揭西县是粤东地区靠北的山区县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收入较低，当地就业机会较少，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地方如何破局？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发展经济，推动自己

的特色发展? 民间信仰文化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增长点。三山国王信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吸引了众多海内外信徒。三山祖庙连接的三山大桥, 满足了榕江两岸居民的交通需求, 改善了交通状况, 是揭西河婆街道欣堂村和庙角村居民期待的项目。此外, 大桥对于揭西县利用三山国王文化改善生态旅游和提升旅游服务同样至关重要。三山大桥的通车是揭西县民生工程的重要部分, 有助于推进广东省“百千万工程”, 促进河婆街道乡村振兴。大桥的使用将改善区域交通, 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缓解节假日交通压力, 并有助于弘扬三山祖庙文化, 提升三山国王文化的影响力, 增进民生福祉, 为揭西县的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

3.2 文化功能: 传承与弘扬潮汕文化

人类学家格尔兹所言, 文化是一种历史长河中通过符号传递的意义模式。它将传统观念以象征形式展现, 借助文化的符号系统, 人们能够相互交流、持续传承, 并且培养出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生命的观点^[8]。三山国王“护国庇民”、“有祷必应”的要旨, 为当地人所崇敬, 深深扎根于笃信神明的信众心中。可以说三山国王已经深入到每个潮汕人心中。陈春声在研究樟林乡时提出本社人在这个文化圈里享受“有份”的参与感和认同感^[9]。三山国王信仰反映了潮汕地区人民的神明崇拜和文化象征。城市化导致城乡结构变化, 潮汕人迁徙至城市并定居, 其后代逐渐脱离传统乡土文化, 新一代青年不再认同祖先崇拜, 城市生活中缺少祭拜场所, 使得这一传统仪式难以维持。

要传承和发扬当地文化, 三山国王信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 潮汕的“营老爷”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已成为潮汕文化的象征, 并成为向海外传达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三山国王信仰的魅力和潮汕人的自豪感促使他们继续传承这一文化。同时, 各种拜神娱神活动也在帮助年轻一代在仪式空间中传承文化。文化是逐渐积累和培育的, 没有捷径。年轻人在文化氛围中的短暂停留也是一种传承。随着世代交替, 他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品味和修养。研究其中的民间信仰活动及其关系可以洞察区域社会的各种关系。“通过对这些故事与传说的富于同情心的理解, 研究者可更加深刻地重构乡村的历史^[10]。

3.3 社区群体: 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潮汕地区普遍信仰神明, 普遍相信“抬头三尺有神明”, “敬鬼神而远之”, 以神灵指引规范行为。三山国王崇拜不仅唤起乡土意识和尊本崇源思想, 还增强社区凝聚力和道德操守, 促进社区安定和谐。宗族文化影响下, 三山国王对生

者具有稳定心理和情绪作用, 解决纠纷, 肯定身份认同。在纷争械斗中, 人们会因共同的信仰而和解。每当乡亲们在校内外发生无谓的争斗时, 旁观者总会劝解: “你们何必争吵呢? 我们都是敬拜同一座庙宇的兄弟姐妹。”听闻此言, 双方的怒气顿时烟消云散, 相互握手, 和解如初^[11]。这便体现三山国王信仰对传统文化中“和”的传承。比如樟林地区的“八街六社”的庙宇布局发展就是一个复杂互动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的, 是社会发展和社区整合结果, 但即使这样也不影响樟林地区的团结与社会稳定^[12]。杨庆堃提出, 宗教的功能在于, “引入宗教元素能够增进集体的凝聚力和提升成员的忠诚度, 通过使成员们关注集体的神圣象征, 有助于降低因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引起的矛盾, 同时将他们的思想提升至集体层面”^[13]。通过信仰活动, 社区成员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这种共同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 促进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3.4 海峡两岸发展: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潮汕地区是著名的侨乡, 许多潮汕人迁往东南亚和中国台湾。他们在新环境中面临挑战, 寻求神灵庇护。潮汕人将三山国王神像带到海外并建庙供奉, 形成了众多三山国王庙。揭西河婆镇的霖田祖庙是这些庙宇的起源, 以其宏伟著称。庙前牌坊对面的石块上刻有“三山国王祖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山祖庙每年吸引中国台湾和海外信众朝拜, 庙内记录了来自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地的捐款, 并供奉着这些地区捐献的神像。寻根, 便是地缘文化与祖籍身份的认同。中国台湾民众对祖籍有着一一种浓厚的乡土情怀, 在民间信仰中体现出“祖根”情怀。连横认为, 粤籍中国台湾人祭祀三山国王, “是皆有追远报本之意, 而不敢忘其先德也”^[14]。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初会见马英九时提出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两岸交流交往融合, 两岸同胞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增强两岸文化认同。今天我们追求两岸和平发展, 而民间信仰也是联系两岸的纽带之一。很多大陆的民间信仰传统在中国台湾发展起来, 也让两岸百姓有了更多联结、沟通的缘分。

4 总结

民间信仰作为基层社会文化的核心, 塑造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它曾是国家传递文化价值和地方文化传承的桥梁。近现代以来, 民间信仰成为连接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纽带, 对维系两者关系至关重要。三山国王信仰丰富了当地文化经济, 促进了地区发展。在现代社会, 民间信仰通过

多种方式传承,成为国家与地方交流的平台。民间信仰被视为传统文化资本,经过整合改造以适应现代化。同时,它通过融入国家象征符号,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发展空间和适应性。

参考文献

- [1]刘希孟.潮州路明貺三山国王庙记[M].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五)中华书局,1986:18-19.
- [2]李秀萍.民间信仰与明清地方社会——以三山国王信仰为考察[J].清史论丛,2015,(02):176-191.
- [3]陈春声.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J].史学月刊,2001(1):123-133.
- [4]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原著出版年:1961)
- [5]让·马克·夸克著、佟新平等译·合法性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6]包尔丹著、陶飞亚等译·宗教的七种理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7]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 [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1.
- [9]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J].清史研究,1999,(02):1-13.
- [10]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J]·历史研究·2003(5)·
- [11][马来西亚]张肯堂.霖田古庙与河婆文化[C].贝闻喜、杨方笙.三山国王丛谈.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97-117;另有一则故事与此相似,在贝闻喜《潮汕三山国王崇拜》一书中有所记述,“大庙爷制止两姓人民的械斗”。
- [12]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J].清史研究,1999,(02):1-13.
- [13]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原著出版年:1961)
- [14][清]连横.中国台湾通史,卷二二·宗教志[M].
- 作者简介:陈志文(1998.10-),男,汉族,广东湛江,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宗教社会学。